



A u x B o r d s d u P o l i t i q u e

政治的边缘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姜宇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ux Bords du Politique

政治的边缘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姜宇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边缘 / (法)朗西埃(Rancière, J.)著;
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8
(当代学术思潮)
书名原文: Aux bords du Politique
ISBN 978-7-5327-4267-7

I. 政... II. ①朗...②姜... III. 政治-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803 号

图字: 09—2005—21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727956

特约编辑 张尧均

责任编辑 马 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政治的边缘

[法]雅克·朗西埃 著
姜宇辉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109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267-7/B·263
定 价 19.00 元

前言

目前这个版本是《政治的边缘》的改写和扩充，它首先标志着那些已经改变了这个标题的含义的工作阶段。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0年，收录了写于1986到1988年间的三篇论文，在当时为终结的主题着魔的政治和理论的情形之下，它提出了政治的边缘的问题。政府官员和大学以各种不同的论调鼓吹着历史或革命的幻觉的最终完结。有时他们把政治作为一种过时的古董。有时则相反，他们又高歌其回归。不过，这些都意味着同一件事：从今以后政治将摆脱社会解放的种种承诺和所有末世学期待的界域。它已回归其本质，即对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种种利益的精明治理。那种无数人为其捐躯的平等性让位给对能带来经济利益并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平衡秩序的算计。最终摆脱了其革命起源的民主，将复归于对共同体的不同利益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平衡所达成的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管理的智慧所宣称的这种胜利却伴随着种种怪异的现象。尤其在法国，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新一轮爆发突兀地揭穿了宣扬以往的冲突已然终结的单调的官方话语。这样，一种新的起源的图景就呈现于终结的版图之上。在后政治智慧的合唱之中，这种前政治时期的仇恨的回归揭示出这些思索“终结”的思想家们对于他们试图超越的历史目的论的依赖。这表明，在政治的某种隐喻的地形学之中存在着现实主义的意图。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政治的起源和终结的问题而代之以探索其“边缘”的普遍问题，即种种不同的观察其划定领土、设定疆

界、遭遇分裂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回归那些根本性的隐喻：柏拉图所描述的在民主的海洋和真理的大地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亚里士多德对于在城邦的诸构成原则之均衡性与其各空间的具体分配之间的一致性的沉思。

以此为起点就有可能重新质询那些终结的话语所引以为自明的概念和时间的框架。有可能重新思索民主、平等或共同体并保持一种双重的距离：对于那些满足于理性化民主的新进展的人，应该放弃荒唐的平等的乌托邦并终结阶级斗争所导致的分裂；然而，对于那些发现了民主形式和平等修辞的谎言之最新罪证的人，应该指出阶级剥削的现实性。在非政治化的自满和揭露政治谎言的怀乡症之间，应该通过批判主导性的同一化和对立模式来界定第三条道路。针对对于平均主义的极权制的揭露，“平等者的共同体”试图揭示在平均主义原则和共同体观念之间的关联中所存在的那种内在的可疑特征。针对那些怀念“人民权力”抑或谴责其以往过失的人，针对形式民主的揭露者，以及那些满足于自由民主的人，“民主的功用”表明了“人民权力”从来都不是一个总体化的主体的自我在场，并且，民主的形式或外表既不是投射于剥削之上的帷幕，也不是对于共同利益的理性化管理的司法程式。“政治的终结”表明，众多世纪末的所谓的具体分析与新的智慧价值不高，它们只是对政治哲学最古老的描述模式和解决方案的重复。关于大众民主以及政治多元主义和市场所提供的享乐的增殖之间的关联的时髦话语，只是沿用了柏拉图对于民主的人的描述。而有关共识民主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对亚里士多德试图把 *dēmos*^[1] 与其自身分离而采取的种种策略的变卖。“政治的终结”是政治的非政治化的终极形式，它从其诞生时起就是政治艺术的悖论性原则。改头换面的古典概念的兴起伴随着已然平息了的现代性的伟大宣言，而它所体现的只是这种政治艺术

[1] 西文 *democracy* 一词由希腊文的 *dēmos*(人民)和 *kratos*(权力或统治)这两个词演变而来。——译者

奠基其上的“心理学”的界限。后现代的智慧把政治的安定重新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原则之上，即大众的混乱情绪的“社会性”聚合。因此，对于分散的享乐形式的明智管理所遭遇到的就是政治的古典心理学所不能或不愿认识的东西：排斥性的“一”的激情，而此种情绪远比大众的纷乱更为原始也更具破坏性。这个难题就要求我们重新把政治作为一种智慧的场所来进行思索，而此种智慧是大众无序的、冲突的力量所固有的。

然而，重新思索政治，并不仅仅是回归其最初的概念框架，而且也要揭示这个观念内在的含混性。如果“政治的” (*le politique*) 被作为哲学思索的对象，那么就其作为不同的派别为了权力和此种权力的实施所进行的斗争这个通常含义来说，无疑这个中性的形容词显然体现出与名词“政治” (*la politique*) 之间的差异。我们谈论的是“政治的”而不是“政治”，这就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是法、权力和共同体的原则而不是政府耍弄的花招。然而，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增强名词的含混性，那么，把哲学性的形容词与通俗的名词区分开来是无济于事的。“政治”至少有着一个优点：即它所揭示的是一种行动。而“政治的”则把共同生活的迫切要求作为对象。不过，这个表面上看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命题却包含着一个构成全部问题的预设：即政府的行为、调节不同的集体生活和群体行动的法规都预设了同一个原则和观念：“共同生活”。因此，有两种看待这个统一性的方式。或者，我们从普遍的人类共同体的本质的角度来进行思索，即，共同体应该追求的共同的善，或维持共同体以便抵御令人痛苦的情绪的最小程度的恶；或者，我们把此种要求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社会模式的表现。在这两种情形中，政治问题的焦点都在于澄清统治的各种实践与作为其基础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指向权力、根本性的情绪（此种情绪维持着统治与服从之间的关系）以及赋予此种关系以某种风格的生活方式。对政治的思索因此在两极摇摆：或者是有关爱与恨、恐惧与怜悯、服从与统治等各种激情的心理悲剧，它可能上升为神学—政治的伟大戏剧；或者是

有关那些形成某种法律和权力形式的风俗习惯的社会喜剧，它可能上升为“共同生活”的伦理学和现象学。

因此，《政治的边缘》的思索为其对象及其概念的逻辑所限定：一方面是对政治艺术的思索，此种艺术通过对各种情绪的巧妙调节来安定共同体；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思索，它导致某种政治集合的方式。本书试图把这种反思推向其极致，甚至改变上面的两种思想的方向：它试图在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修正民主的策略中寻找某种策略原则，而民主实践根据此种原则来反对统治性的法律并抵制出于仇恨而集中的情绪。从柏拉图的民主作为生活方式的理论出发，它试图得出一种双重拒斥的原则，它既拒斥对“形式民主”的批判，同时又拒斥那种把民主还原为自由市场和法权国家的结合。这意味着把政治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逻辑转而针对其自身，这种逻辑可以表述为一些关键命题：政治就是管理共同体生活的艺术；民主就是各种人的生活方式；政治就是把多样性民主的法则转化为共同体的生活原则。

然而，这种逻辑是不可颠倒的。改变方向将导致断裂。因此须肯定两个相互对立的关键原则：政治不是治理共同体的艺术，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纷争性（*dissensuelle*）^[1]的形式，对于集合与领导人类群体所依据的那些规则来说，它是个例外；民主既非政体也不是社会生活的方式，它是政治主体得以主体化的模式。这个双重否定的原则预设了与政治作为共在的本质这种观念之间的断裂。它试图把对政治的思索从对权力的思索之中分离出来。我试图在“政治、同一化和主体化”之中为这种分离提供根据，并把治安（*la police*）（作为共同体管理手段）与政治（作为以平等原则为前提的实践）相区别。这种分离使得我们能够给予政治一个更为清楚限定的地位：政治成为两种原则（治安与政治）相对峙的场域，并成为这样的一个形式系统，在其中每一方与

[1] *Dissensus*（纷争，歧见）的形容词形式，与 *consensus*（共识）相对，在本书中也是作者所使用的一对核心概念。——译者

另一方联结在一起。

这就是我自那时起就试图以一种系统化的模式所发展的论点，尤其是在我的《纷争》^[1]一书中。在构思于1996年的“有关政治的10个主题”（它比这个文集中的最早的文章，即“民主的功用”晚了10年）中，我试图概述这些论点。标题《政治的边缘》因此并不再仅仅是指涉着那场从“政治的终结”的信念性的（doxique）主题向政治的隐喻地形学的普遍探索回溯的运动。它还意味着一种思想的演进，这种思想由于政治概念的含混性而只能缓慢地发展，而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被导向拒斥其自身的总体性并试图思索这些主体化的特殊模式的出现和瓦解的条件。这些模式有时在统治性的法律和对集团的管理制度之下产生此种人类行为的独特意象：政治作为对可感物的分配所进行的纷争性重新构型^[2]，而统治者凭借此种分配来为其合法性提供感性的证据；民主则是那些没有行使权力资格者所拥有的悖论性的权力。

在这些时间跨度达8年的文本和10个主题（我相信这些主题综合了我今天所能作出的有关政治的论述）之间，我插入了三篇写于不同场合的论文。“政治，同一化和主体化”是应邀为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一次围绕同一性（身份，identité）问题所进行的研讨会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重新划分“政治”和“政治的”概念的一些原则，特别是把政治主体化作为主体化的一种特殊模式来理解的原则。思索政治，也就是思索它的特殊主体的本质和行为，而并不是从一种关于主体的普遍理论中推出这些本质和行为，此种理论总是导向关于权力主体的问题。“他者的动因”是源自1995年应邀就阿尔及利亚所作的讲演，该文研究了此种主体化原则的一种特殊的情况，我称之为对一种不可能的同一化的包容。“不可接受者”是两种表面上看来相互独立的力量

[1] 《纷争。政治与哲学》（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巴黎，加利莱出版社，1995年版。

[2] 对“可见者”与“可说者”之间的张力的深刻分析以及对既成的“词与物”的秩序的置疑和颠覆，详见德勒兹在其名著《福柯》之中的精彩段落（尤其是“积层或历史构成：可见者与可述者”一章）。——译者

的交汇：1993年6月，向让-博莱耶的成就致敬的纪念日，这是1993年6月的一次会议；而在这时，关于移民和国籍的帕斯卡法案(lois pasqua)获得了广泛的赞同。此种巧合对于我来说有利于反思政治和文学的边界，并反思二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相互关系，而这个问题由于从其本质上来说不可能被纳入我们的时代因而被一位来自社会党的总理郑重地排除在时代之外。

因此，这些都是“应时”之作，正如“民主的功用”就已经是这样的作品了，它被宣读于1986年在智利（当时那里仍然实行宵禁）举行的关于民主的研讨会上，而同一天，成百上千的人走上巴黎的街头声援大学生和高中生反对严选制的运动；同样，“政治的终结”提交于1988年法国和巴西联合主办的关于权力这个永恒主题的研讨会，而实际上这个主题演化成了对于一场总统选举中的谋划策略的讨论。同样，在这些文章中也谈到了法国的新种族主义的动向或者波斯尼亚的种族战争。思索政治的边缘，也就是思索“时势”怎样凭借舆论的操控者扰乱了所谓的政治事务的秩序——那些和政府的管理者相互关联的舆论的操控者——并再度提出这个问题：即“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的总体正是试图在由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的管理所持续占据的表面之上勾勒出自身所特有的行动及赌注的轮廓。

这种关于“时势”的观念决定了这里所收集的文章的某种用途。每一篇都可以被作为一部独特的剧本来读，意在再现某一个“当今焦点问题”并从中提取出能够激发政治思想的内容，这里的“政治”是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殊模式。每一篇因此都既依赖于它所依据的时势情况，又依赖于某种独特的理论构思，我们可以从特殊的经验事实与对于政治问题的个人理解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判断其时间背景。某些事件已经在记忆中淡去，而理解它们的某些模式在今天看来也绝非完美。我不可能对其进行反思性的修正但又不改变那些思索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反之，如果有可能从其所讨论的问题的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和精确化的话，那我就没有理由保留那些含混的表述。同样，也没

有必要保留那些偏离了讨论的真正目的的表达。因此，在不更改这些文本的结构的前提之下，我尝试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修正，以便在我看来能够消除某些含混并试图在其展开的过程之中澄清这样的观念：即对于我来说，这些文本是开放性的。因此，我更关注的不是保持这些文本的真实性而是力图使得它们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更为有用。

《政治的边缘》的第一版由 Osiris 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我感谢出版社的总裁，达尼埃尔·勒比戈，他使得新一版得以问世。我同样感谢斯泰法尼·格雷古瓦和埃里克·阿桑，他们相信这本著作应该获得新生。最后，我要感谢所有那些 10 年来激励我不断地投入到工作中的种种关切。

目录

前言 / 1

第一部分 从“政治的”到“政治” / 1

政治的终结和现实主义乌托邦 / 3

民主的功用 / 32

政治、同一化和主体化 / 53

第二部分 共同体及其外部 / 61

平等者的共同体 / 63

不可接受者 / 90

他者的动因 / 106

第三部分 政治的 10 个主题 / 117

政治的 10 个主题 / 119

文本来源 / 139

第一部分

从“政治的”到“政治”

政治的终结和现实主义乌托邦

1. 承诺的终结

政治的终结，这一今日遍及大街小巷的传言，往往被描述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终结，而这个时代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时间的运用，即承诺的运用而标划出来的。在法国政界，这个终结非常明显地体现于社会党从第一个7年任期向下一个的过渡。1981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作出了110条承诺。不是100条，是110条。夸大是承诺的本质特征。1988年，他重新当选，但是却没人质询在那些承诺中他到底信守了多少。相反，专家的意见称赞道：除了一个例外（我将回到这一点上），他实际上再没信守什么。专家指出，正是在这7年中，他和我一起改变了时代。我们一扫上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厚重的哲学的和文化的灰尘”。19世纪是一个理想民族的世纪，是共同体的承诺和乌托邦岛的世纪，这个世纪的政治所构想出的未来图景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我们的世纪险些坠入其中的深渊。我们的总统候选人的新立场正是吸取教训，并改变发展的方向。承诺正是造成祸害的原则：它预先提出了一个共同体发展的“目的”（*telos*）^[1]，而其崩塌的碎片却变成了致命的石子。不作承诺的总统最终揭露了政治与未来以及其他种种观念之

[1] 希腊语，“终点，目的”之意，与 *arche*（“开端”）相对。——译者

间长期以来的牵连。政治不再作为驶向乌托邦岛的隐秘航行，从今往后它将作为掌舵和弄潮的艺术，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production*）^[1]的自然的和平和的发展，这种“生产”融合了古希腊的“自然”（*phusis*）概念和逐步推进事物的日常生活的艺术，而那个疯狂的世纪把这种生产和承诺的致命策略混为一谈。

一种特定的政治终结的观念还体现为：把政治世俗化，正如把与个体和群体的产生和繁衍相关的其他行为的世俗化一样；抛弃与权力相关的幻觉，抛弃唯意志论的表象，即把政治艺术作为实现解放和幸福承诺的计划。抛弃把政治的“权力”（*potestas*）与某种观念的 *imperium*^[2]以及群体的目的（*telos*）相等同的做法；使其与劳动、交换以及享乐这些世俗化行动的力量相关联；构建出一种与世界的节奏、万物的声响、能量、欲望和信息的流通同步的政治实践：一种彻底当下化的政治实践，而未来无非只是当下时刻的拓展，当然，这是以必要的纪律和裁员为代价的。这就是那些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的新的时间性。在他们看来，我们最终进入了20世纪，虽然晚了几十年。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延误。尤其是它对于现代性作出了一个古怪的描述。我们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在前的世纪的未来（恶梦）而度过的。而它险些就通过同化将要到来的世纪而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性。它处于两个世纪之间，这将是完成革命的时机，也就是说，同时完成对于政治的王权形象的摧毁和对于此种摧毁所具有的革命形象的摧毁，以便最终进入一个同质性的时代，一个摆脱了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统治的时间性。

与这个不再通过承诺来进行分化的时代相一致，理应存在着一个不再有分化的空间。政府的行话往往把它作为中心。它不再指处于其他部分之中的一个部分，而是对于政治空间的新格局的笼统称呼，此种格

[1] 作者这里把 *production* 故意拆开：*pro-*拉丁文词根，意为“向前”，而 *-duction* 为拉丁文词根，意为引向、引导等。——译者

[2] 原系罗马法上的术语，有统治、支配、权力、命令或指挥权之意。——译者

局形成了一种共识性力量的自由展布，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和流通的非政治性的自由展布。然而，如果宣布时代的开始和终结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么从经验层次上为其定位则产生了许多其他的问题。中心不断闪避。政治的终结看起来毋宁说是分化成了两种并非同步的终结——承诺的终结和分化的终结，并且实际上产生了“政治的终结”的两种派别：一派宣扬新的时代，另一派则强调新的共识。

1988年法国的总统选举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希拉克总理，这个被击败的候选人，实际上和新时代的观念是非常一致的。面对一个被他称为好作承诺的19世纪的老人的候选者，他呼唤着将要到来的世纪的朝气，以及不断推进新事物的事业的蓬勃动力。他正是让我们选择朝气来抵抗老迈，并让我们认识到今日在权力(pouvoir)的实施和力量(puissance)的自由展布之间的类同化。他想再度把悔过置于承诺的循环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他在不作承诺的举动之下所试图掩饰的东西：他不可避免的仍然是一个作承诺的人，一个宣布了他无力办到的事情的人，他只是把陈旧的事物远远推开，而并没有逐步推进新事物的实现。这个总理候选人与那个好作陈旧的承诺、不能或者说不敢承认其承诺的老人相对立，他是一个充满动力的人，一个能不断推进新事物的人，对他投注，就能够让我们在第三个千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承诺使得权力变得无力或荒谬，就出现了应使得力量自然实现为权力的话语。这种表面上看似独一无二的话语与此种关于承诺的终结的思想相一致，与完全掌控公众舆论（知识阶层的和大众阶层的）之喉舌的超意识形态的政治相一致。这是一种不胫而走的话语。然而，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对于这种看似将具有持久影响的主导性的社会学话语，总有至少那么一刻它是行不通的：这就是当那些候选人在面对面的电视直播秀中孤注一掷的时候。这个时刻，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总理体验到了这一点：对于拒绝作出承诺者，不可能迫使他承诺或背弃其承诺。不可能迫使其发动致命的一击。他想迫使对方同时承认承诺和力量、话语和现实、作出承诺却从未实现的人

和充满活力并不断进步的人。然而，在我们时代的所有话语之中都涉及的这种话语模式，至少有一刻它没有被理解——既没有被这种话语所针对的对象、也没有被那些对这场唇枪舌战进行仲裁的观众们所理解——这个时刻就是作出结论的时刻，在那时应完成从力量到权力的转化，把他的表演转化为能力的证明和对权力的享有。

那么，为导致这个如此自然地表现为非结论性的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基本上没发生什么。面对这个为了使我们进入新千年而以力量来获取权力的候选人，他的对手只需采取另一种立场就足够了，即不是趋向目的旅程而是面临的深渊；他须做出的不是承诺而是其反面，即对于最坏情况的预期。^[1]这也是我即将讨论的唯一一种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候选人不作任何预期，只除了最坏的情况——分裂、内战——目的是不使人们被这二者所诱惑。他把这场人们认为已经过时了的战争作为选择的令人生畏的界域。他因此提出了政治的另一种终结和另一种界限。这种终结和界限使得承诺和力量都失去了有效性，而它的沉默表明其存在只为了一件事：团结，并维系那种阻止社会坠入深渊的“一”的力量。针对那种作为促进世界活力之艺术的政治，它把政治视作以“一”的力量的合理性使用来阻止内战爆发的艺术。它甚至以政府辞令的形式来使我们理解这一点：那种认为大众颠覆了陈旧的二元对立并在自身中实现和平的观念是错误的。团结的“一”的力量和分裂的双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导向了一种艺术，即政治，和一种德性，即权威。

2. 古典的回归

对最坏情况的预测足以使得政治终结的空间发生转化并把后者引向

[1] Promettre 从词义上来说既有承诺又有预期，很显然，对于最坏的情况只能作出预期。——译者